

考古學報 第六冊 第一、二分合刊

目 錄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及經濟問題的著作與蘇聯考古學家們底任務

.....蘇聯考古學第十七卷社論(1953)(1)

殷代卜人篇——甲骨斷代學丙篇.....陳夢家(17)

河北省唐山市賈各莊發掘報告.....安志敏(57)

1953年12月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及經濟問題 的著作與蘇聯考古學家們底任務

蘇聯考古學第十七卷社論

在蘇聯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中，對於蘇維埃的學者們提出了巨大的任務。關於在我國建立共產主義的斯大林式的綱領決定着蘇聯科學進一步的發展。在蘇維埃學者們面前放着一個莊嚴的任務：佔領世界科學中的第一位。

我國的社會科學是根據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鞏固基礎之上的，這些科學已經獲得了高度的發展。在科學底發展中，當代的偉大學者——斯大林——起着巨大的作用。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與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底出版是蘇聯人民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這些科學上的偉大理論成就不僅對於語言學與政治經濟學有意義，而且照亮了我國共產主義建設底道路，指出了各部門科學工作者正確進行研究工作的方法。

對於蘇聯考古學來說，斯大林底這些著作也具有巨大的奠基性的意義。這些著作在蘇維埃考古學家們的面前提出了一連串的任務，同時為考古學底進一步發展揭開了巨大的可能性。

斯大林關於社會主義經濟、歷史文化、人種語言底重要問題的深刻研究，使我們能夠進一步具體地研究古代在我們領土上居住那些氏族、部落與人民。對於蘇聯科學的發展來說，斯大林同志對於馬爾底反科學的公式的批評是有巨大的意義的。

斯大林寫道：“誰都承認，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能發展，不能進步的。”¹⁾ 批判地修改自己的研究工作就可以幫助考古學

1)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版，1955年，29—50頁。

家們擺脫馬爾派的謬見，這謬見妨礙了正確地去解決歷史問題。整個地說來，考古學是基於馬列主義思想而發展的，它所走的道路是正確的，然而許多考古學家犯了馬爾派的錯誤，這些錯誤混淆了考古科學底個別問題。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底著作出版之後，在考古學家們面前出現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揭露錯誤；這些錯誤是由於馬爾底一些非馬克思主義論點而產生的。自從斯大林底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出版以來，考古學家們在修正以往底錯誤方面而作了不少工作。在討論會上，在各個科學機關底科學會議上，在出版物上，為斯大林底號召所鼓舞了的考古學家們企圖指出根據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而進一步發展考古學的道路。但是必須說明，那些曾經是馬爾“信徒”的考古學家們還沒有立刻了解：對於科學底發展來說，批評與克服馬爾派的錯誤有着什麼意義。於是就出現了一種斷言，即好像馬爾只是在語言學方面犯了錯誤，馬爾對於蘇聯考古學方面並沒有任何關係，考古學是根據自己的正確路線而發展了的，因此不應當談到某些考古學家底錯誤，因為這些考古學家只不過是對於馬爾底理論採取了同情態度而已；另外的一些人則斷言說，馬爾在語言學方面創立了有害的“新學說”，但是在考古學方面他的工作還是寶貴的²⁾。這兩種斷言在本質上都是企圖把馬爾底錯誤論點以及他作為考古學家的“門徒”們引出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之火。大部份考古學家都是出而反對這種歪曲真正事物的企圖的，並且幫助犯過錯誤的同志們批判地評論馬爾底錯誤論點在蘇聯考古學史中的有害作用³⁾。然而，雖然關於批判馬爾

3) 見物質文化史研究所科學會議報告。這個會議是討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底著作與考古學問題的。

古代歷史公報 1950年，第三期 202—207頁，1951年，第二期 239—234，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考古報告 第36期 205—209頁。

5) 見：

吉謝列夫與蒙加依特：考古學與馬爾底理論 1951年4月31日

文學報 第49號：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對於蘇聯考古學的意義。

古代歷史公報 1951年，第二期 5—11頁。

吉謝列夫：斯大林關於考古學底著作與原始社會考古學問題

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考古報告 36期 1952年 3—5頁。

阿爾茨霍夫斯基：克服考古學與歷史中底馬爾“理論”的方法。

莫斯科大學公報 1951年，第十二期。

戈爾陳特：馬爾底“循環法則”與語言史對於物質文化史的關係問題。

派在考古學上的錯誤已經作得很多，這個工作仍是不能算作已經結束了。常常還看見：有一些的評論好像是宣言一樣，在評論中並沒有深刻分析錯誤和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問題。

必須寫出關於蘇聯考古學史的著作，用這種方式來完成批評考古學家們過去底錯誤，在這著作裏應該表現出為考古學之成為科學而鬥爭的道路，而關於在這條道路上所產生的錯誤與謬見（包括馬爾派的）底批判，將佔有極大的地位。

一九五二年第十三期的布爾什維克雜誌上登載了評“歷史問題”雜誌一文，這篇文章公平地指出：考古學家們是“採取家庭方式”解決批評問題的，他們很少將批評超出科學會議範圍之外而提到出版物上去。結果所形成的情況是：關於馬爾底“理論”所帶給考古科學的害處底寬度與深度，與論界並沒有一個概念。

對於自己已往錯誤的沉默態度，在考古學家中批評與自我批評底薄弱，不可避免地會引導向馬爾主義底再發，妨礙着用新的方式來改進工作。在廣泛討論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以後，在阿爾他蒙諾夫（М. И. Артамонов）底論文與發言中，⁴⁾在伯恩斯坦（А. Н. Бернштам）具有巨大理論思想錯誤的著作匈奴簡史（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лунов）中，在科洛波娃（К. М. Когобова）底著作早期希臘社會（Из истории раннегре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中，在庫福金（Б. А. Куфтин）底著作科爾希達考古學資料（Материалы к археологии Колхиды）第二卷中，馬爾派性質的錯誤還是出現了。在烏克蘭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同人們底許多著作中也

論文集反對語言學中馬克思主義底庸俗化與歪曲化。

第一部，170—189頁 1951年 莫斯科。

在斯大林著作出版之後，有些過去跟隨馬爾的考古學家們在論文裏承認了自己的許多錯誤：

特列基亞可夫：斯大林關於語言與語言學的著作與民族起源某些問題歷史問題，1950年，第10期 1—18頁。

阿爾他蒙諾夫：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底著作與蘇聯考古學。

蘇聯考古學 第十五卷 1951年 7—13頁。

然而，應該指出：特列基亞可夫與阿爾他蒙諾夫底論文還有某些缺點，首先是對馬爾的批判不夠。

4) 見小冊子 斯拉夫民族起源中的論文 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底著作與蘇聯考古學。

論文集 蘇聯考古學 第10卷 1951年；

1952年在烏克蘭考古學家第六次代表會議上關於西徐亞居民人種組成的報告。

有着嚴重的馬爾主義的與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思想錯誤，尤其是在葉菲明柯(И. П. Ефименко)、法不利茨烏斯(П. В. Фабрициус)和某些其他學者底著作中。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在這考古研究所底出版物中還沒有出現揭露這些錯誤和表明要改進該所工作的文章。國立列寧格勒大學考古教研室也沒有為根除馬爾主義偽科學的謬見而鬥爭。在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底出版物中有着一連串的思想理論缺陷。在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所出版的不好的著作中也有考古學家們底著作。一九五二年蘇聯科學院所出版的盧登科(С. И. Руденко)底著作阿爾泰山區的遺物與西徐亞人(Горноалтайские находки и скифы)就包含着巨大的理論錯誤，蘇聯科學院物質文化史研究所準備反對在考古學中馬克思主義底庸俗化這一論文集已經很久了，但是直到目前還沒有出版；考古學院底許多同仁們並沒有在出版物裏批評自己所犯的錯誤。

這些事實說明：不可以認為消除馬爾主義底後果的這一工作已經完成了。為蘇聯科學底黨性與純潔性而鬥爭，本身就包括為消除馬爾和崇信他的“門徒”底非馬克思主義觀點而鬥爭，這是一個不可缺少的部分。

在第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馬林科夫同志特別強調為制止資產階級思想與各種庸俗化的歪曲出現而鬥爭的意義。馬林科夫同志說：“衆所週知的關於哲學、生物學、生理學、語言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討論揭露了各種科學部門在思想方面的嚴重缺點；推動了批評和不同意見的爭論的展開，在科學發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科學界許多部門中存在的學閥式的統治業已被粉碎了。可是，在一些科學部門中，個別科學家集團的壟斷現象還沒有完全根除，它們排斥生長中的新生力量，不接受批評，並企圖用行政方法來解決科學問題。在互相吹噓，包庇錯誤的腐爛的氣氛中，任何科學部門都無法順利發展；如果科學家企圖建立單獨的小集團的壟斷，就必然會使科學停滯不前，以至腐化”。⁵⁾

斯大林說：如果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自由的批評，任何科學都是不可能發展，不可能進步的，因此我們應該更勇敢地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目的是要在創造性的討論過程中克服仇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殘餘，這些理論既包括馬爾派的觀點，也包括其他庸俗化簡單化的觀點，在這些觀點上表現了資產階級思想底影

5) 馬林科夫：在十九次黨代表大會上關於聯共（布）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
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94—95頁。

響。甚至於在較好的著作中也有個別的錯誤與缺點，弄清楚這些錯誤與缺點就可以幫助這些著作底改善。批評應當是尖銳的、原則性的、有科學根據和創造的。在我們這裏甚至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即批評文章或書評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了善意的介紹，在文章中缺乏對於該書所必須應有的批評。必須反對惰性，反對死的教條，這些教條妨礙了科學繼續前進。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順利發展科學創造底最重要的條件。

斯大林底著作是經常在思想上武裝着蘇聯人民、在思想上武裝着我們的科學。蘇聯學者們底任務在於馬列主義理論底基礎之上具體發展自己部門的科學。這就需要經常地研究理論，要使每一個科學著作都不只是包括了對於遺物深刻的專門研究，而且概括着理論。然而到目前為止的情況是：考古學家們收集了大量的具體材料，收集的速度愈來愈快，可是理論上的分析則趕不上收集材料的速度。許多重要的理論問題是與具體的研究有關的，或者是一般地接觸着考古學底方法論的，但是這些問題很少或者完全沒有被研究過。

假如以後再不充分注意揭露現代資產階級考古學家底反動觀點的話，那就是完全不可容許的了。尤其應該注意的是：近年來外國的考古學已經更公開地開始服務於帝國主義的侵略目的了。

外國底古物常常是與蘇聯領土上的遺物相聯繫着的，可是我們幾乎完全沒有研究，這不能不承認是近年來工作中的缺點。蘇維埃考古學家們底任務是研究這些古物，同時要與資產階級考古學家底理論進行鬥爭，這些考古學家們在別有目的地研究着考古材料時，極力地歪曲着歐洲各國與其他各國底歷史。

與其他部門的科學一樣，資產階級考古學的特點就是極端的唯心論。唯心論表現在承認文化發展底動力不是物質原素，而是精神原素，也表現在否認客觀歷史的法則性，表現在宣傳歷史過程底不可知性。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們以為歷史研究底範圍只是收集、分析和批判依靠經驗的材料，並且根據年代學的順序把這些材料排列起來，因為精確地知道過去是辦不到的。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們反對在考古材料底基礎之上改造歷史。他們宣稱考古學文化是精神的現象，這現象是由思想組織成的，這些思想本來是不可能被觀察到的，但是可以以物質材料底形式而客觀化。唯心論把社會描寫為意識發展底產品，這種理論在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中統治着，它完全地滲透了資產階級的考古學。

除了其他的唯心論以外，世界文化底世界主義思想在資產階級的考古學中佔有極大的地位。個別的考古文化似乎只是這個世界文化底地方性的體現；這些理論家們以為研究個別民族底文化是不重要也不需要的，應當研究世界文化發展的階段，這些階段同時也是世界精神發展與人類思想積累的階段。在宣稱按階段的一致，以世界主義的公式來代替具體歷史考古研究的同時，自認為是唯物論者的馬爾和他的“門徒”們，事實上是與資產階級考古學極端唯心論的觀念結合在一起了。

有一種理論斷言地說地理因素是古代文化發展底基本原因，應當把這種理論看作是考古學中的反動方向之一。這種斷言是企圖將社會現象拖出歷史範疇之外，拖出人類社會環境之外，是企圖只用地理環境底影響來解釋社會現象。

在馬克思主義底社會科學裏充分地揭露了資產階級科學底無能，蘇聯的考古學家們永遠是基於這些著作來反對資產階級學者底反動理論的。在揭露德國法西斯“學者”仇視人類的種族理論方面，我們做得特別多。自從希特勒主義毀滅以後，種族論底宣傳在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停止，只不過是這宣傳底中心移到了美國。但就是在西歐各國英美帝國主義者也是極力使種族主義思想復活。在所謂“史前史”的考古材料堆裏他們在尋找着關於某些民族低劣和某些民族優於另一些民族的證據。因此，資產階級的考古學家們公開地服務於殖民者和戰爭挑撥者的帝國主義政策。對於資產階級理論無情鬥爭是蘇聯考古學家們的首要任務之一；蘇聯考古學這一論文集也應積極地參加這一鬥爭。

在蘇聯考古學家們所發表的著作中有一些學閥制的狹窄性。許多的著作只是為少數的專家寫的，而為廣大的蘇聯科學界和一般非專家的讀者們所寫的著作却很少。這裏的意思並不是說考古學著作底通俗化（雖然這也是考古學家們底重要任務），而是說應該有一些結論和理論概念，使歷史家們、教師們和學生們知道祖國歷史底重要事實，這些事實可以在科學工作和教學工作中受到利用。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問題與經濟問題的著作為科學底發展揭開了巨大的可能性。這些著作對於考古學家們也提出了重要的問題，如關於研究社會歷史底早期階段時的社會經濟法則問題。考古學家們可以利用大量的材料來研究生產力底歷史，在古代社會中物質財富生產者底歷史，可以研究古代社會的經濟。

研究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品生產是一個很重要的任務。斯大林寫道：“商

品生產比資本主義更老一些，它在奴隸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奴隸制服務過，然而並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過，並且替封建制度服務過，可是，雖然它爲資本主義生產準備了若干條件，卻沒有引導到資本主義”。⁶⁾考古學家們研究過貿易，而且把商品當作貿易底物件研究。現在則需要研究商品生產；因此，古代社會生活底新方面就會完全出現了。

奴隸社會時期，在某些地區統治着原始公社制，而在另一些地方則發展着商品生產，研究這兩種區域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最有興趣的問題。

考古學家們一直都在研究經濟，但是這研究是片面的和靜止的。在斯大林著作底基礎之上，在生產關係必需適應於生產力底特點這一法則基礎之上，我們應當研究古代社會經濟發展底其他方面。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要仔細研究關於社會發展底不一致的速度問題，這些速度底原因與後果問題。

關於民族起源底研究是科學底一部門，在這一方面馬爾主義底影響表現得最強烈。斯大林同志指出了在歷史過程中文化與語言之間的關係，這個指示對於民族起源問題是有巨大意義的；“這些同志在這裏的錯誤，是他們沒有看見文化和語言之間的差別，並且不懂得文化按其內容說是隨着社會發展的每個時期而變更的，語言則在幾個時期中在基本上是仍然不變的，同樣地服務於舊文化，也服務於新文化。”⁷⁾

語言是極重要的人種特徵，脫離語言更是不可能解決人種起源底問題的。假如在解決民族起源問題時引用馬爾底荒謬論點的話，人種起源研究的情況就會愈搞愈糟。只有斯大林同志關於語言學問題的著作使這些研究免於混亂，從“階段性論”底鎖鑰下被解放了出來。

最大的錯誤之一是企圖只根據考古材料來解決人種起源問題。斯大林寫道：“社會以外，無所謂語言。因此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規律，只有密切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繫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的歷史，去進行研究，才

6)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人民出版社 1952 年版 15 頁。

7)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人民出版社 31 頁。

有可能。”⁸⁾

與研究各民族發展早期階段的語言史一樣，解決民族起源問題需要考古學家們與語言學家們的密切合作，需要吸引大批的歷史學家與人種學家參加工作。爲了解決這個問題，一九五一年十月，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人種學研究所、物質文化史研究所與歷史學研究所召集第一次聯合會議，討論了根據斯大林關於民族與語言的學說如何進行研究民族與語言的起源問題。⁹⁾無疑地，這次會議在蘇聯考古學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因爲這次會議促進了創造地掌握斯大林關於民族與語言的學說。然而在會議上主要只是提出了最重要的問題，而解決這些問題則需要努力和長期的工作。

爲了使考古學家們能够參加民族起源問題，必要確定考古材料在解決這些問題上的作用。過去考古學家們錯誤地把文化與語言混而爲一，他們忘記了：一個社會與在這基礎之上所產生的語言是要經過幾個文化發展底階段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同樣一個考古文化可能屬於幾個不同語言的部落。當這種混而爲一的錯誤性被弄清楚了以後，有些歷史學家們就開始否認可能利用考古學來研究民族起源問題，他們的理由是語言與文化並不是一個東西；這種觀點是不正確的。在確定考古文化在一定領土上的順序時，在研究這些文化時，考古學給與了重寫各民族歷史的材料。“考古文化”這個概念比較“文化”這個字的一般概念來得要廣泛些。物質文化一系列的人種特徵並沒有消失，而是由一種考古文化繼承地傳給另一文化。因此考古材料可以幫助研究部落與民族的歷史。然而，應該注意到，考古學文化常常是根據表面特徵而確定的，尤其常常是根據陶器底相似而確定的。衆所週知的，有時甚至於在一定的考古文化範圍之內有着相似的物質文化形式，然而這並不足以證明帶來這文化的人屬於同一人種。假如將一切考古學文化看作是統一的文化人種集團底體現的話，那就是錯誤的了。考古學文化常常包括着廣大的空間，但是却需要很長的時間來尋找它們，原因只是有些有名的遺物在外表上是一面的，而考古學家們沒有找到可以分辨它們和精確確定其人種屬性的特徵。因此，關於歷史人種區域與這些區域對於“文化”這個考古學名詞的關係問題是很複雜的，而且不

8) 同前 22 頁。

9) 會議報告提綱，蘇聯科學院出版社版。會議報告登載在蘇聯科學院通報歷史與哲學例刊上，1951 年第八卷、第六期。569—577；1951 年第四期 5—6 頁上。

能認為是已經被解決了。研究考古學文化底種族本性問題是考古學家們底最重要任務之一。必需爭取弄清楚：繫在“文化”這個名詞之後的有那些部落與民族。

在解決一切人種起源底問題中，考古學家們必需最緊密地與語言學者們合作。蘇聯的考古學家們極端地希望語言科學能够多多注意語彙、語彙史、地名等，即多多注意那些可以幫助根據語言研究民族史與物質文化史的題目。

斯大林關於“從氏族語言到部落語言，從部落語言到部族語言，從部族語言到民族語言……”¹⁰⁾的發展公式，使我們有可能研究各民族由遠古（當現代語底因素奠定時）到今日的發展線索。但是關於語言發展早期階段的問題目前還沒有被研究過。

研究人類發展早期階段時語言共同體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任務。不解決這個問題就不能深入研究部落與民族底歷史，也不可能研究階級社會開始存在底歷史。資產階級科學中的母語論與我們現代關於社會發展早期階段的觀念是不能相合的。關於在蘇聯語言學家觀念中的基礎語，應當引用不同的語系來仔細地研究。對於考古學家們來說，研究古代語言集團底基礎語問題是特別重要的。

有時人們把人種起源問題當作是一個獨立的科學部門，使這個問題與其他的考古學問題分割了開來，這是不正確的。應當記住：人種起源問題常常是考古研究底不可分割的一方面，不能算作是獨立的科學。

在研究蘇聯的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方面，在蘇維埃考古學家面前有很多嚴重的任務。近年來在中亞細亞的得西克塔什（Тешик-Таш），在外高加索的沙坦尼達爾（Сатани-Дар）等地，在西伯利亞和遠東都發現得有舊石器時代的遺物。這些遺物迫使我們重新考慮許多過去認為是已經被解決了的問題，例如：歐洲居民底起源問題，舊石器時代底年代，分別地方性文化集團底可能性。近年來在我國領土上所進行的地層調查使我們感到需要從新考慮歐洲舊石器時代底總畫面。應當仔細而謹慎地研究這些問題。舊石器時代前期是人類發展史上最古的一個階段，弄清楚這一階段底社會組織與經濟基礎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知道氏族語言出現時那些早期歷史時期底語言，因此很難想像由氏族語言過渡到部落語言的過程本質，但是考古學總可以幫助解決氏族與部落的相互

10) 斯大林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第10頁。

關係問題，整個地說來，應當利用廣泛的材料（包括人種誌學、語言學及其他科學底材料）來解決。

崇信馬爾的考古學家們以為：有聲語言是出現得比較晚的，在這種語言以前有“姿態與表情底語言。”斯大林指出：“所謂手勢語言底意義——由於它極端貧乏和被局限着——是小得不足道的。”因此考古學家們應當着手研究原始社會史底最重要問題。在解決原始思惟，原始藝術底發展問題時，我們應當比過去更高地估計舊石器時代上期社會發展底水平。在三十年代的科學研究裏，考古學家們關於意識形態與其他上層建築現象的著作佔據着很大的地位。然而這些研究都是基於馬爾底幻像（什麼“圖騰階段”，“宇宙階段”等）上，或者是基於列維·布留爾（Levy-Bruhe）關於原始思惟的唯心理論，這種理論是被馬爾帶到蘇聯科學裏來的。現在的任務在於：要根據斯大林所創立的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來研究原始意識形態與其他的上層建築現象。

為了消滅“按階段的”公式，必需寫出舊石器時代人類個別集團底具體歷史，同時要指出：在這具體的歷史中，原始社會及其文化發展底一般規則是如何被曲折了的。

在研究新石器時代方面，雖然有很大的成就（這成就表現在已經出版或即將出版的許多著作中），但是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問題。白俄羅斯、烏克蘭、高加索與外高加索底新石器時代幾乎沒有被研究，更不要說我們的中亞細亞諸共和國了。這就增加了研究蘇聯各民族古代史的困難，冰河期結束時居民底分佈問題，部落底形成及其相互關係問題等都因此而不易解決了。應該注意蘇聯歐洲部分北部殖民底時間與條件，並且研究各地部落底文化發展階段。

應當比平常更堅決地爭取寫出關於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考古學的著作，要爭取在這些著作中更廣泛地總結歷史順序。

必需解決新石器時代末期農業部落底未來命運問題與紀元前二千年代時畜牧經濟普遍底原因問題。今後考古學家們不能只以研究舊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一些較大的考古學文化（如特列波里文化，木室（срубная）文化等）而滿足，而應當爭取研究這些文化底部落變化，因為在這些文化後面無疑地是隱藏着許多部落的。

在新石器時代末期與青銅時代方面特別重要的問題是：研究烏克蘭，伏爾加流域，西伯利亞與中亞細亞的草原文化，目的是弄清楚它們在文化歷史上極端相

近的原因，確定他們與古代語言共同體的相互關係，其中也包括與印歐語系的相互關係。在這裏應該特別注意與資產階級沙文主義的印度日耳曼理論作鬥爭。這理論是過去被法西斯的歷史家們所發展起來的。但是直至今日還是資產階級考古學底有力武器。研究東歐平原北部與中部的考古學們也有這樣的任務，他們應該確定：那一些考古遺物屬於這地領土上古代人種社會存在底時期。

考古學家們需要比現有分期法更為明確的原始社會史分期法，因為應當避免斯大林在給霍洛波夫同志的信中所指出的那種錯誤，即將社會發展在一個時期所特有的現象搬到另一個時期，然而在這個時期底條件下這些現象是不可能存在的。首先必需重新考慮原始社會史底莫爾甘分期法，恩格斯在他的經典著作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中採用了這個分期法。恩格斯寫道：“莫爾甘曾是頭一個以專門知識謀使人類史前具有一定體系的人，到日益更多的資料加以改變時為止，他所提供的分類方法，無疑的還是有效的。”¹¹⁾現在已經是材料底大量擴張堅決要求重新考慮莫爾甘公式的時候了。有人提議召開科學會議討論分期法底問題。然而我們的估計是：如果不計算一切為科學所積聚起來的材料是不可能研究分期法的，如果從個別的零碎例子出發是不可能確定整個原始社會史底分期法的，因為這些例子並不能確定歷史的總法則。不從具體材料出發而從推理出發是不可能確定分期法的，但是如果完全不理莫爾甘和恩格斯的公式，認為它是完全過時和不合理的話，那就不對了。在科學底發展中，莫爾甘與恩格斯的分期法起了很大的肯定作用，現在隨着科學底新成就，它需要精確化和修正，但不能因此就說莫爾甘分期法底每一部分都是不合於新情況的。

在斯大林底著作中所發展的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使我們有了可能去研究階級形成與國家發生底時期。關於最初的階級社會底基礎是如何形成的這個問題，考古學可以供給實際的材料，考古學家底重要任務是在物質文化遺物底基礎之上確定前階級社會與階級社會之間的界限。研究階級社會是如何確立起來的。過去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嘗試，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有馬爾公式底反映。考古學家們也可以幫助闡明蘇聯領土上古代國家底發生條件與特點。

斯大林曾指出奴隸制時期與中古時期帝國底特徵。這個指示對於一切研究古

11) 恩格斯 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

張仲實譯本 31 頁。

代與中世紀的歷史學家與考古學家們具有特別的意義。不久以前我們的學者們關於古代東方諸國，希臘化時代諸國與羅馬帝國曾進行過一些研究，但是對於研究組成這些聯盟底基本居民卻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對於那些“組成帝國，各有自己的經濟基礎，各有自己早已形成的語言”的部落和部族，¹³⁾現在考古學家與歷史學家們已經更多地注意了。考古學家們應當改建這些民族底具體歷史，更多地注意在我國領土上希臘文化中地方性的因素。正確的方法是：寫出關於個別民族的專論，這些民族曾經有過自己的文化，並且為反對奴役而英勇地戰鬥過。但是在這裏也要防止誇大，防止企圖抹殺古典宗主國底文化影響，防止企圖把各地部落與民族底發展過程看作是與外在影響完全無關的。必需記住馬克思主義經典作者們關於古典文化在世界史上的進步作用的指示。

必需也估計到：黑海北岸底古代城市是古典世界底根本組成部分。資產階級的歷史家們說這些城市只是地中海底原料基地，其實這些城市具有自己獨有的特徵，並不只是原料基地。相反地，整個地說來，這些城市對於古典文化底形成曾經帶來很大的貢獻。

此外還應當指出：關於黑海北岸古典國家底經濟基地問題直到目前還是注意得很少；關於這些國家中物質財富底直接生產者問題，關於這些國家底人種與社會組成問題則完全注意得不够。只有解決了這些問題以後才可能寫出古代黑海北岸底真正歷史。

馬爾及其“門徒”們在不同的現象之間找出了想像的相似因素，於是就在這階段之上宣佈了按階段的一致。例如，他們以為存在得有西伯利亞的西徐亞人，阿爾泰山的西徐亞人等，證據是在這些人之間有個別的相似因素。由這種想法產生出來的“西徐亞階段”妨礙了研究各地的人種特徵。雖然大家都知道，所謂黑海西徐亞人只不過是幾個人種上相接近的集團，可是只有到現在，當科學擺脫了馬爾按階段論的鎖鑰以後，我們才開始將草原地帶的西徐亞部落與森林草原地帶的部落分開來，並且確定他們與這些區域後來的居民之間的進化關係。然而需要更深刻地研究：在德涅潑爾河中流西徐亞時期物質文化與“墓地文化”底遺物之間，在“墓地文化”與6—8世紀的斯拉夫遺物之間可能有些什麼因襲的關係。也應當弄

13)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13)頁。

清楚：西斯拉夫人對於德涅潑爾河斯拉夫區底形成有什麼影響，他們之間有些什麼關係。必需更深刻地研究所謂“網形花紋陶”（мнуровая керамика）底文化底諸部落及他們與魯惹克（лужик）、德涅潑爾河流域和其他斯拉夫部落之間的關係。

一九五二年一月與二月，物質文化史研究所召集了關於西徐亞與薩爾瑪特考古學問題的科學會議，會議對於重要問題給予較大的注意，並且查明了在這一方面工作的嚴重缺點：到現在為止還有馬爾影響底殘餘尤其是企圖不依靠足夠證據而尋找部落孤立的根本發展，並且說西徐亞人（有時甚至於說薩爾瑪特人）起了斯拉夫人祖先底作用。必需深入研究大的文化集團及其內在的相互關係，目的是為了更明確地表示出西徐亞與薩爾瑪特時期部落與部族底成份以及他們在形成現代蘇聯各民族底祖先及其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在斯拉夫俄羅斯考古學的面前有巨大的而複雜的任務。考古學家們可以而且必需參加解決一些問題：確定斯拉夫人種集團形成的時間與地點，俄羅斯底起源問題，古代俄羅斯部族底形成，闡明它分裂為大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部的條件。應當利用整個斯拉夫考古學底條件來研究東斯拉夫人底歷史與考古學，因此必需研究和注意西斯拉夫與南斯拉夫考古學。在繼續研究古代俄羅斯文化史與古代俄羅斯城市時，必需特別注意深入研究這一方面的年代，目的是更清楚地描寫前於基輔國家出現的那個時期。最後，要注意古代俄羅斯的鄉村。關於這一方面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被研究過。

應當利用考古材料來研究封建社會底發生問題。現在在談論斯大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並且利用着考古學和歷史的材料時，已經可能明確地敘述東斯拉夫社會底長期發展，敘述引導到九世紀基輔國家形成底歷史道路，基輔國家變成了偉大的積極力量，這個力量促進了自己基礎底形成與鞏固。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里加召集了蘇聯科學院歷史與哲學部和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科學院歷史部的聯席會議，在考古學家們底報告中明顯地指出：不管過去有過什麼觀點統治着，波羅的海沿岸封建制的產生是和德意志的征服沒有關係的，它比征服發生得早，是由於當地諸部落內在的發展而形成的。這一個例子說明了：在考古材料底基礎之上是可以從新研究封建社會底發生問題的。必需使我們的學者們注意這個問題。

研究中亞細亞的考古學家們很注意於闡明奴隸制底崩解過程與封建關係底發生。這些過程由於對花刺子模（Хорезм）、布哈爾呼達得（Бухархудады）首都瓦剌黑齊（Варахши）與旁遮坎特（Пенджикент）、蘇格得（Согд）底最大城市之一）中世紀早期遺物的研究而被弄清楚了。因此，根據考古材料不僅可以弄清階級社會底發生，而且可以弄清楚一個階級社會是怎樣被另一個階級社會所代替的。有順序的研究斯大林關於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學說就使考古學家們能夠給與歷史學家們以本質的幫助。

中亞細亞底考古學家們必需特別注意研究物質財富直接生產者底歷史，要研究農民的庭院、手工業區、灌溉農業底技術等。特別的任務是：爲了寫出中亞細亞底灌溉史，應當有計劃地對於古代的水利系統進行研究，這樣的歷史對於土庫曼大運河與其他水利工程建築底修建都是有實際意義的。

對於我國廣大的但是在考古學上還沒有被研究的區域——東西伯利亞，堪察加與遠東——，現在是必需認真地研究了。必需培養這一方面的考古學家，因爲幾乎沒有在這一方面工作的專家。

在其他問題中應該特別注意史料研究法問題，有些受着馬爾主義者影響的學者們不重視這問題，他們企圖將一切對於古物的研究拉入資產階級古物學底範疇裏，並且否定比較排列法（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是一個幫助考古材料底分類與斷定年代的重要方法。因此在這一方面就有一定程度的落後。雖然蘇聯的考古學家們研究了一系列重要的年代學分類法，但是，有時仍舊部分地利用孟德里烏斯（Монтелиус）、德雪列特（Déschêlette）、哥羅德錯夫（Городцов）、什披金（Спицын）等人過時的公式，並且在利用時不作必要的修正。然而更糟的是：有的考古學家們在自己的著作並不是利用這些雖已過時但還有用的作品，而是不批判地採用着資產階級反動學者底年代學。例如，西歐（尤其是德國的考古學家們）所採用的絕對年代學（абсолютн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常常包含着故意僞造了的事實，僞造的目的是增加中歐或北歐某些文化現象底年齡。確定年代常常是不精確而且沒有充分根據的。必需建立新的古物年代表，尤其是對於研究我國歷史很重要的考古學部門（例如斯拉夫俄羅斯考古學）來說，這樣作是尤其需要的。必需廣泛地討論和研究確定年代法，研究考古學各部門底年代學。必需更多地由研究古物底形態過渡到分析它們。必需在研究古物、建築物 and 遺址時廣泛地採用自然科學——愛克

同光學、花粉分析、放射性分析等，必需改善田野考古研究底方法。在精確化研究方法，爭取使考古學的論證變成無疑的時候，我們可以透徹到某些考古學文化底本質中去，在這些考古學文化後面常常有很多的部落。

蘇聯的考古學家們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從不拒絕採用歷史比較法。然而與其他科學部門中（例如在語言學中）一樣，在考古學中的歷史比較法有着嚴重的缺點。應當認真地討論採用這種方式來研究各種考古問題底容量與具體條件，必需記住：比較排列法是歷史比較法底技術方式之一，與資產階級考古學的不同在於它是建築在另一種基礎之上，估計了歷史前途，估計了在各個區域文化現象發展底不同速度的。

對於不同時期考古文化底製圖注意得不够，這也是考古工作底缺點之一。

正確研究影響與文化交流問題是極其重要的。馬克思主義要求學者們首先要在當地發展底物質基礎之上來觀察文化現象，其中也包括意識形態底現象。只有遵守這個根本條件才可能注意文化交流底結果。有許多在馬爾底影響之下的考古學家們，他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從“按階段的一致”出發，而抹殺了各個文化現象底民族特徵，作出了世界主義的結論，抹殺了人民的創造特性。在與這些錯誤理論鬥爭的過程中也不可以陷入另一極端，以至完全否定互相影響。企圖將一切文化歷史現象只看作是內在發展底結果。這也是不對的。沒有孤立的歷史過程，歷史是在各民族底互相影響之下而經過的。

必須使物質文化史研究所在考古材料與文字史料底基礎之上正在編撰中的蘇聯古代史成為真正的人民歷史，在這歷史裏要反映出歷史過程底一切最重要方面，要使我國領土上的各民族都能從這歷史裏知道自己的起源，知道自己文化底來源。

蘇聯考古學底成就是巨大的。黨與政府非常關懷考古工作。在蘇聯已經進行過幾百次考古遠征了。

蘇聯的考古學家們大有可能根據關於保護文物的斯大林法律而進行發掘。在偉大共產主義建設區域考古學家們所進行的工作尤其巨大，已經收集了有用於寫出我國各民族古代史的大量材料。蘇聯考古學家們底勞動結果已經被包括在許多重要的歷史研究裏了。有些民族在不久以前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也沒有文字歷史（例如蘇聯北部諸民族），關於這些民族底歷史的考古材料就特別重要了。馬列主義哲學莊嚴而完整的系統是蘇聯學者們的指導，因此蘇聯的考古科學可以得

到巨大的成就。斯大林關於語言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天才著作將我們的科學提到了新的更高階段。這些著作在蘇聯考古學家面前提出了許多任務，以上所指出的只不過是一部分。蘇聯學者們知道自已的責任是必需解決重要的科學問題和改正過去的錯誤。根據着斯大林底天才著作，蘇聯的考古學還會得到新的成就。爲了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與其他的蘇聯學者們在共產主義建設者底第一列隊伍中共同前進，蘇聯的考古學家們還要更多地努力。

(張軼東譯)